

譯序：邁可·布若威與生產的政治*

林宗弘

我的主要關懷，是期待在將社會學導向批判的方向上，做點小小的貢獻。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將工作現場的景象呈現給學術界，揭開可能隱含另一種未來的、社會底層的視野。那是我認為被遺忘的視野。

貝理斯 (Jeff Byles) 訪布若威，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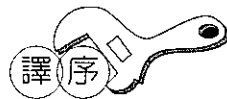
* 本文寫作過程中，感謝柯志明教授、陳玉華小姐、楊弘任先生與鄭力軒先生的指正，一切疏失概為筆者之責任。



2004年起，邁可·布若威（Michael Burawoy，1947-）開始擔任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會長。一般來說，美國社會學協會的會長任內總是在各大學發表演說，似乎不須負擔太多的行政事務，因此，這反而像是一個榮譽職務，表示對該社會學家終身成就的一種肯定。布若威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與堅持質化研究的鮮明立場，能夠在非馬克思主義傳統與量化研究佔主流的美國社會學界獲得讚揚，除了他個人幸運的田野經歷與優異的學術成就之外，或許也反映了美國主流社會學界的自我反思。

《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of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the Monopoly Capitalism*, 1979）這本書，是布若威關於「生產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這一系列民族誌著作的開端，也是其作品的第一個中文譯本，筆者有幸參與翻譯工作，忝作譯序，除了自己藉此機會對本書的學術脈絡，以及布若威的社會學理論與方法論方面的成就，做一番回顧之外，也希望本文能有助於不同學術背景，例如組織理論、勞工歷史研究、經濟社會學與人類學界的讀者，進入《製造甘願》所描述的資本主義工作現場，與布若威進行一場經驗上與智識上的溝通與爭辯。

概括地說，布若威的學術成就，主要在於建立「生產的政治」的勞動過程理論典範，並且推展了人類學上的「擴展個案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這兩個方面。他在理論與方法上的觀念，主要承繼了社會人類學上的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分支、工業社會學中的組織理論，以及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思想。此外，布若威也積極投入有關階級研究、社會主義工廠的研究、歷史比較方法與人類學方法論的爭議中。本文將依序回顧布若威的學術系譜與生涯、生產政治的理論架構、擴展個案方法的進展，以及布若威對台灣與中國勞工研究的影響。最後，在讀者閱讀本書之前，譯者應該對本書的翻譯過程與幾個關鍵詞的選擇，向讀者先做一番交代。

請容筆者累贅地聲明：由於布若威學識淵博，再加上筆者本身的能力所及，僅能簡要地介紹上述各點，並且，本文將盡可能不重複本書的內容，畢竟《製造甘願》一書中最精彩的部分，正是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現場、充滿活躍生命經驗的民族誌，這要靠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自行領略。

—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在初步連群島（Trobriand Islands）從事有關庫拉圈的人類學研究。在1922年所發表的《南海舡人》（1991 [1922]）一書的緒論中，馬林諾斯基提出了幾項田野調查與民族誌寫作的原則。這些人類學方法的原則，包括了參與觀察法，也就是研究者應該「既是理論家又是田野工作者」（P.31），並且「直接與土著一起生活」（P.27）。第二個原則，是方法上的整體論（holism），研究者應該詳究部落文化的每一面，將部落視為一個具有一貫法則的、融合的整體（P.33）。第三，研究者應該蒐集具體的經驗資料，使用自然科學上的歸納法得到推論

(P.34)。此外，馬林諾斯基認為人類學研究者，應該以某種移情作用「掌握土著觀點」(P.47)，以理解土著的主觀情感與文化構造。

這是社會科學質化研究中，參與觀察法的濫觴。然而，馬林諾斯基與芮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等第一代人類學者一樣，無視於人類學與帝國主義及殖民政權共生的事實，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採取了十分天真(naïve)的看法(Kuper 1983, Marcus and Fisher 1986)。馬林諾斯基認為他的參與觀察方法，由於在田野地中經歷一段較長時間，土著不堪其擾之後，「只好把我當作生活的一部份」(P.28)，因此仍然能夠不影響研究對象，而做出客觀的科學判斷。

另一方面，美國文化人類學者瑪格利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鮑亞士(Franz Boas)影響下，對薩摩亞(Samoa)人的性別觀念及青少年成長的過程，做了引發爭議的報導，以此來批判美國社會的性別觀念與教育體系，日後卻成為人類學者重返田野地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則公案(Mead 1993[1928], Freeman 1983, Marcus and Fisher 1986, Burawoy 2003a)。

1930年代後期，在人類學者將視野由太平洋的孤島，轉向非洲部落時，他們所面對的不再是相對封閉的社會體系，而是複雜的殖民政策、部落政治衝突與親屬關係等不同層次社會生活的互動及變遷。馬林諾斯基的學生之一麥斯·葛拉克曼(Max Gluckman)創立了曼徹斯特學派的社會人類學分支，強調對個體的理解，以及社會衝突的關懷，對參與觀察法提出了重要的修正(Kuper 1983)。

曼徹斯特學派認為，在面對非洲部落這種開放的個案時，人類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是有限的，絕不可能如馬林諾斯基所言，對部落生活的各方面都詳加考察。因此，在《封閉的系統與開放的心靈》一書的導論中，葛拉克曼等人提出五個簡化研究的程序。首先，人類學者應該限定研究範圍與面向；其次，應該納入未經分析的複雜事件，以保持解釋的開放性；第三，對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加以摘要使用；第四，對研究中的其他實際層面，暫時採取素樸的推斷；第五，將研究範圍內的事件加以簡化處理。葛魯克曼將這些條件，稱為人類學研究者不得不接受的「素樸的限制」(the limits of naivety)(Gluckman 1964)。

曼徹斯特學派的方法論是「擴展個案方法」。葛拉克曼在「社會人類學的技藝」(*The Craf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1967)一書的導論中，提出「擴展個案方法」的概念。他要處理的第一個問題是：在一個開放的田野地，何謂「個案」？

葛拉克曼將「社會情境」定義為「一系列複雜事件的組合」，透過對這些社會情境的分析，把具體的村落生活，也就是所謂的個案，當作「在一個社會系統與文化中，特定的個人與群體發展社會關係的過程的舞台(stage)」(Gluckman 1967: xiv-xv)，特納(V. Turner)則將此一觀念轉化為「社會劇」(social drama)的分析概念(Kuper 1983)。此外，葛拉克曼認為，擴展個案方法應當以個案來補充或修正一般的人類學理論，特別是指當時的結構功能理論。

葛拉克曼的學生凡·維爾森(J. Van Velsen)指出下列幾點：首先，曼徹斯特學派強調社會衝突的必然性，因此，社

會人類學者應該注意「規範衝突」，也就是各種抵觸結構的異常現象或是意外事件；其次，田野工作者應適當地處理與個案相關的歷史材料。第三，維爾森進一步闡釋了社會過程的分析，這裡的社會過程，指的是「個人如何在實際上操縱他們的社會關係，並依據任何特殊情境中的需求，對不同規範提供給他們的選擇項目，加以利用。」社會過程分析，建立在幾個假設上。第一個假設認為人類學個案不是孤立的，「為分析目的而將某一單位孤立出來，不該跟事實上的孤立相混淆」；第二個假設則是認為社會規範並非一致而堅固的整體。相反地，他們經常被安排得十分模糊，而且彼此矛盾；第三個假設，「社會的成員可以操縱這些規範以增益自己的目標，同時無損於該社會所表現的社會關係持續的結構。」由於報導人可以操弄社會情境，研究者應該注意到報導人在群體中的地位、立場與其價值判斷。總之，個案的紀錄必須包括整個社會情境，並且當作社會過程的一部份，其中可能充滿衝突與個人的意義詮釋，而不該當成孤立的案例，一廂情願地拿來說明某個概括原則（Van Velsen, 1967）。

曼徹斯特學派如何看待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呢？葛拉克曼提到了幾種田野地常見的情況，首先，研究者可能會直接帶來社會的劇烈變遷；其次，報導人經常利用外來研究者的資源或權威，來提高自己的權力與地位，研究者也這樣利用報導人。因此，研究者必須把自己對田野地的社會過程所造成的反饋（feedback），包括在社會情境分析之內（Gluckman 1967：xviii-xix）。即便如此，某些人類學者仍然認為，葛拉克曼採取了無可奈何的「素樸的限制」觀點，對

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不平等的關係，裝做天真無知（Marcus and Fisher 1986）。

曼徹斯特學派的社會人類學，在理論上關心的是在一個向現代國家與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開放的的個案中，所產生的社會衝突、與個人對社會情境的操弄。在方法上，曼徹斯特學派關注的是個案與理論的關係、參與觀察方法的限制、與研究者介入時可能造成的後果。曼徹斯特學派的理論特質與方法論，對布若威的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Burawoy 1991, 2000）。

二

正當馬林諾斯基漫遊於太平洋小島之際，泰勒主義式（Taylorism）的「科學管理」與亨利·福特（Henry Ford）率先引用的流水生產線，開始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工廠中發展開來，並且遭到當時仍以工匠為主的工會組織的抵抗。泰勒（Frederick W. Taylor）認為，工人天生是厭惡工作的，唯有透過對於勞動分工的零細化、「科學地」測量每個動作並重組工作流程、以及計件工資的安排，才能激發工人的經濟理性，並且同時擴大整個工廠的產量，這在管理學文獻中被稱為「X理論」。在實踐上，福特則建立了T型車的流水生產線，成功地提升了汽車生產的效率，然而，在主要由美國勞工聯盟（AFL）組織起來的罷工抗爭之下，福特大幅提昇了工人的薪資與福利，甚至建立起專屬於公司員工的社區、育樂性社團等等，福特的說法是要讓工人買得起公司的產品，這

就是所謂的「福特主義」(Braverman 1974, Edwards 1979, Scott 1998)。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到1929年經濟大恐慌之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歷了一次短暫的繁榮時期(Hirst and Thompson 1999)，在資方的福特主義與工會組織迅速成長的影響下，美國資本主義建立起特殊的工廠體制，這種體制被稱為「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或是「家父長主義」(paternalism)，是戰後「大量生產方式」(mass production)的前身(Brody 1968, Piore and Sable 1984)，在工業關係的實踐層面上，泰勒主義的科學管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影響力反而不如福特的實際作為(Burawoy 1985)。

位於芝加哥的西方電子公司霍桑(Hawthorne)廠，是一間實施福利資本主義的工廠，擁有兩萬九千名員工，為貝爾電信公司生產交換機。1924年起，在哈佛管理學院的羅利斯伯格(F. J. Roethlisberger)、與霍桑工廠勞資關係處任職的工業工程師狄克森(W. J. Dickson)的主持下，針對科學管理的各項命題，在該廠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梅佑(E. Mayo)則是在1928年訪問該廠並加入研究行列，對工人的行為，提出了十分不同的解釋(Mayo 1949)。泰勒認為，工人是一個受到工資與獎勵所驅動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西方電子研究卻顯示，工人在工廠中的表現，更像是馬林諾斯基與牟斯(B. Mauss)關於交換的著作中，所呈現的「社交人」(homo gregarious)，此一論點，日後被稱為「人際關係學派」(human relations)，後來進一步發展成企業管理學上的「Y理論」(Grint 1991, Scott 1998)。

霍桑工廠的實驗，原來只是要測量燈光照明與生產效率之間的關係。羅利斯伯格與狄克森發現，除非工廠已經暗到幾乎看不見而無法進行工作，否則無論燈光調亮或是調暗，工人的產量都大幅提昇。另一方面，甚至當工程師不再調整燈光時，只要研究者繼續測量，工人的產量還是提升了，而他們卻仍然向研究者抱怨燈光調得太暗或是太亮。後來，研究縮小到六個女工的範圍，研究者開始進行長期觀察與訪談，分析工廠中非正式人際連帶的作用。第三階段則在工廠裡設下三個實驗組與對照組，並持續進行觀察到1932年。這些工業社會學與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只要是研究者出現，工人們為了求榮譽或爭面子，就會提高產量，因此西方電子研究的結論是，泰勒所強調的那種科學管理要素，例如生產線的速度、燈光甚至計件工資等等，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力，遠遠不如工人的道德規範、社交需要與工廠中的人際關係(Mayo 1949, Grint 1991:123-7, Scott 1998)。梅佑則對此一研究做出結論：工人的非正式小團體的抵抗，例如限制產量的行為，是工人堅持類似土著的團體規範，所謂「原始的忠誠」，拒絕或無法理解管理者的經濟理性，所導致的後果。因此，管理者應該放下敵意，有耐心地說服工人並尋求合作(Mayo 1949, Burawoy 1979, Grint 1991, Scott 1998)。

西方電子研究是工業社會學上一次重要的典範移轉，除了在理論上突破了泰勒主義「科學管理」的迷思之外，還凸顯了另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那就是社會研究的困境：研究者一旦出現在田野中，被研究者的社會行為、社會關係與意義的詮釋立即走樣，這就是所謂的「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事實上，西方電子研究者就企圖用深度訪談，控制訪員的態度與表情、放鬆受訪者的情緒並仔細聆聽他們的抱怨來解決此一問題，這也是他們給管理階層的建議（Mayo 1949）。「霍桑效應」成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的重要謎題（Grint 1991）。

在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都市社會學民族誌研究的訓練下，工業社會學家唐納德·羅伊（Donald Roy）解決「霍桑效應」的方式，就是使用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法，以避免工業心理學實驗所造成的研究困境（Burawoy 2000）。1944年，羅伊在芝加哥的一家吉爾機械廠生產線上，工作了十一個月，留下詳盡的民族誌記錄。他的結論強烈反駁了梅佑的說法。在該廠的計件工資體制下，工人一旦提高產量，計件單價就會下滑，除了少數破壞工作速率的趕工者之外，多數工人的薪水反而因此減少了。「理性的」工人不得不搞小團體，以限制產量或是藏業績的方式，來因應管理階層的「不理性」（Roy 1960, 1980, Burawoy 1979）。

羅伊突破性的作品，成為工廠民族誌的濫觴（Smith 2001），也使得人類學研究由邊陲地區進入到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隱蔽的核心」（hidden abode）。然而，戰後的組織理論卻並未延續這個發展，一方面，組織理論開始將早期工廠研究的論點一般化，研究的單位包括了各式各樣的組織，如醫院、學校等等；另一方面，其理論爭論的重心轉向組織與外在環境、組織的控制與權威類型、以及組織與技術之間的關係上。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的組織理論作品中，又以詹姆士·湯普生（James Thompson）的研究最具整合性。湯普生將

組織的技術層次，組織的管理層次與制度層次區分開來，並且分析了組織為了保護其技術核心、用來因應外在環境的幾種緩衝策略（Scott 1998），這與布若威在勞動過程、內部國家與內部勞動市場，以及壟斷資本主義體系的三個分析層次，是相應的，布若威在書中坦承受到湯普生的啟發（Burawoy 1979）。

然而，布若威對於受涂爾幹影響的第一代人際關係學派、受現代化民主理論家影響的第二代人際關係學派，與主要是延續韋伯權威類型分析的、控制與衝突學派的組織理論傳統，所採取的是一貫強烈的批判態度。除了效法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評之外，布若威似乎受到孔恩（Thomas Kuhn）的啟發，認為組織理論的研究成果，應該可以被馬克思主義的勞動過程典範所改寫，並得到全新的解釋（Burawoy 1979）。

三

當馬林諾斯基在英國發表其人類學論點，而芝加哥霍桑工廠的員工在越來越昏暗的廠房中趕工之際，莫斯科的列寧，則煩惱於革命後的內戰與經濟崩潰，並且寄望泰勒的科學管理，可以為他解決社會主義工廠的控制問題（Grint 1991）。

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說法，資本主義在一般利潤率下降、週期性的生產過剩與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兩極化（polarization）所引發的階級鬥爭下，不可能克服生產力

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而終將被無產階級革命所埋葬（Marx 1967）。然而，如葛蘭西所言，俄國十月革命是一場「反對《資本論》的革命」，一方面為馬克思主義者帶來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另一方面卻對馬克思本人的預言，提出了最強烈的質疑：為什麼革命沒有發生在勞工運動最為強大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Burawoy 1982, 2003b）

隨著列寧病死與史達林取得蘇聯政權、法西斯與納粹主義的興起，二十世紀初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均下場淒涼。1927年在德國，羅莎盧森堡與李普克內西死於右派軍人的暗殺，威瑪共和的社會民主黨政權隨即遭到希特勒竄奪。托洛斯基遭俄共流放，最後在墨西哥被暗殺。義大利共產黨的領導人葛蘭西遭到法西斯主義的迫害，在獄中以暗語寫下了一系列針對共產黨路線爭辯的札記，提出了有關政治與文化「霸權」的著名分析，最後在1937年病歿獄中（Anderson 1979, Burawoy 1982, 2003b）。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霸權的繁榮與保守的政治氣氛，以及冷戰時期的背景下，現代化理論與結構功能論成為美國社會學主流，使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更加黯淡。然而，隨著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美國與法國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陷入不景氣、學生運動與反戰運動的政治動盪局勢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再次流行起來，成為社會學界裡引人注目的分支（Anderson 1979, Burawoy 1982）。

先進資本主義或是壟斷資本主義，是如何逃過革命一劫的？這個問題困擾著所有戰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布若威曾經回顧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理論，幾個相關支派，都希望

對這個問題提出解答（Burawoy 1982）。

第一種解釋來自於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這批學者集中於《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期刊，其中又多以保羅·拜倫（Paul Baran）與史威齊（Paul Sweezy）的作品為出發點（Burawoy 1982）。拜倫與史威齊的《壟斷資本》（*Monopoly Capital*）一書認為，壟斷資本主義中的大公司透過對銷售活動的控制、廣告開支、鼓勵非必要的浪費等方式來刺激消費，而國家則透過擴大軍事支出以吸收生產剩餘，來克服資本主義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Baran and Sweezy 1966）。在《國家財政危機》（*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一書中，歐康諾（James O'Connor）進一步提出了資本主義國家企圖調和壟斷資本的積累與社會控制的合法性，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壓力，卻導致公共支出的不斷擴張，終於引發嚴重的財政危機（O'Connor 1973）。本身是工匠而非學者出身的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對勞動過程的分析，則指出壟斷資本主義為了剝奪工匠的技術並擴大產業後備軍，其勞動過程的發展趨勢，是構思與執行的分離，並導致工人的「去技術化」（deskilling）（Braverman 1974）。鮑理士（Samuel Bowles）與金蒂斯（Herbert Gintis）針對美國學校教育的分析，則指出學校系統的發展，與資本主義及勞動過程的發展趨勢相「符應」，學校「再生產」了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在經濟生活未能改變之下，自由主義的教育改革終將失敗（Bowles and Gintis 1976）。大衛·諾柏（David Noble）的科技史研究，也將美國科學教育及工程師階層的發展，視為加強勞動控制與緩和階級鬥爭的工具（Noble 1977）。此外，奧地

利的托派學者厄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延伸了孔德拉提夫（Konratieff）與熊彼得（J. A. Schumpeter）的論點，將資本主義一般利潤率下滑、十九世紀末以來幾次重要的經濟危機與科技革命的發展週期相結合，提出所謂的「長波」理論（Mandel 1975）。約翰·羅默（John Roemer）則另闢蹊徑，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家所喜愛的數學模型，放棄勞動價值說而以剝削為起點，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改寫，影響了亞當·許沃斯基（Adam Przeworski）與艾瑞克·萊特（Eric Olin Wright）等人，前者認為，歐洲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路線，是在有組織的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結盟的困境之下，工人理性計算之後「同意」（consent）的結果，此外，他還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回歸「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Przeworski 1985）。這一個以數學推理、賽局理論與量化統計為主的研究取向，被稱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Analytical Marxism）。

前述除許沃斯基與艾德沃茲（Richard Edwards）等極少數作者，引進葛蘭西與韋伯的論點，著重霸權與抵抗等概念之外，「每月評論學派」的政治經濟分析，通常是以資本主義必然發生一般利潤率下滑與生產過剩的危機為出發點，並且將非經濟因素視為「上層建築」，強調國家公共支出、學校教育與勞動過程如何有助於壟斷資本主義克服經濟危機，因而具有經濟決定論的傾向。

與此相對的第二種理論發展，則是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或者被稱為是「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Hegelian Marxism）。法蘭克福學派可以追溯到青年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論點、盧卡奇（Georg Lukács）的《歷史與階級意

識》一書中對階級覺醒的強調，以及葛蘭西的霸權理論（Burawoy 1982）。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與阿多諾（Theodor Adorno）分析文化工業在麻醉工人階級意識上的作用（Anderson 1979），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強調科技的發展如何將工具理性發揮到極致，抹平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人差異，造就了新型態的極權主義，其中，富裕的勞工階級早已失去革命的動力（Marcuse 1966）。布若威認為，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與湯普森（E. P. Thompson）等人，由於強調勞工階級覺醒與文化的重要性，可以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遠親（Burawoy 1982）。

相對於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唯心論與精神分析取向，以及認為資本主義與現代科技已經成功地麻醉人心與消除抵抗的悲觀主義，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與奧菲（Claus Offe）等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學者，更著重於晚期資本主義中國家的角色，以及系統的矛盾與危機。哈柏瑪斯在《合法性危機》一書中，改寫了系統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產生一般利潤率下滑的「經濟危機」時，政治系統與文化系統的介入將會導致危機的移轉，而非消失。如奧菲所言，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機構，難以調和合法性與協助資本積累兩種彼此衝突的功能，面對資家促進商品化的積累需要，以及各種社會運動要求去商品化的抵抗，在處理經濟危機時將會導致「行政的再商品化」（Offe and Ronge 1975），而這將導向行政管理的「合理性（財政）危機」與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危機」，使民眾開始質疑資本主義國家，亦即政治系統的遊戲規則。當國家企圖透過教育與文化體制動員群眾，以擴大

公民參與的方式來克服合法性危機時，又必須面對資本主義瓦解社會連帶與傳統價值之後，公民集體冷漠的「動機危機」(Habermas 1975)。換句話說，哈柏瑪斯等人並不認為晚期資本主義已經克服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危機只是透過政治與文化系統移轉並且延後，在政治經濟局勢動盪的一九七〇年代，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似乎即將爆發。

戰後討論先進資本主義何以存續的第三種觀點，是法國的結構馬克思主義，在英語世界最著名的期刊，就是長期由派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主編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結構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是從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以「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哲學」對沙特存在主義與英國人道主義等左派思潮的攻擊開始的，從而引發波及英、美、法三國馬克思主義者有關哲學與意識形態、封建主義的歷史研究、國家理論與經濟人類學的一系列論戰，影響甚為深遠。在《保衛馬克思》(For Marx, 1969)一書中，阿圖塞認為在青年馬克思與成熟的馬克思之間，存在著「認識論上的斷裂」，後者徹底拋棄了黑格爾唯心論與個人主義，而採取了以階級為主體的、結構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其次，阿圖塞放棄了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到的，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論點，提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由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ion)的矛盾」的分析，阿圖塞與巴里巴(Etienne Balibar)的《閱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一書，則重新界定了生產力、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等概念(Althusser and Balibar 1970)。人類學者葛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批判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本主義個

體「理性」，並運用結構馬克思主義的多元決定模型來解釋前資本主義社會。赫斯特(Paul Hirst)、悉尼斯(Barry Hindess)與安德森等英國戰後新一代學者，企圖用結構馬克思主義改寫封建主義的理論分析(Anderson 1974, Hindess and Hirst 1975)，而希臘裔政治學者普蘭扎斯(Nicos Poulantzas)在與英國政治學者密利班(R. Milliband)之間，針對資本主義國家「工具論」與「結構論」的論戰中，提出了國家機構(state apparatus)需獨立於資產階級短期利益，透過社會福利政策調解階級鬥爭，才能夠維繫資本主義長期穩定的「相對的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的概念，並且企圖在社會形構與政治體制之間建立一般性的通則(Poulantzas 1969, 1973)。這場爭辯啟發了跨越發展社會學、政治學與歷史社會學的「國家中心論」取向的研究，批判了世界體系理論對於國家角色的忽視(Skocpol and Evens 1985)。結構馬克思主義引起了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如湯普森的強烈反彈，認為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最終仍然決定於經濟」的看法，僅僅是經濟決定論的新版本(Thompson 1981)。

戰後討論先進資本主義未能革命，共產黨政權卻誕生在俄國的第四種馬克思主義觀點，包括了發展社會學上的依賴理論、歷史社會學與農民研究。這些研究者多數涉及了列寧與盧森堡關於帝國主義擴張動力的論戰，以及多布(Dobb)與史威齊對封建到資本主義轉型的辯論(Hamilton 1976)。摩爾(Barrington Moore)與沃爾夫(Eric Wolf)等人以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著名的小農生產方式與階級政治分析為啟發，分別探討了農民革命與極權主義的發展

(Moore 1966, Wolf 1966)。繼弗朗克 (A. G. Frank) 之後，埃及政治經濟學者阿敏 (Samir Amin) 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強調不同生產方式與其連屬 (articulation)，以及核心與邊陲區域之間不平等的交換 (Amin 1976)，而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不但擴張了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分析的時間與空間，也加入對於半核心、半邊陲國家的流動與核心霸權移轉的論點 (Wallerstein 1974, 1983)。這些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爭論，被某些研究者貼上以探討生產方式聯屬為主的「生產中心論」與探討資本流動及全球商品鍊為主的「流通主義」的標籤，而布若威顯然偏愛前者。布若威認為，早期的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由於其經濟決定論的特質，可以被當成是「每月評論學派」的分支 (Burawoy 1982)。不過筆者認為，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透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世界體系擴張的過程中，核心與邊陲之間的不平等交換及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抵抗，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未發生革命而走上修正主義路線、以及二十世紀的共產革命均由邊陲國家的農民所主導這兩個否認《資本論》的事實，放進了同一個解釋的框架中，與每月評論學派集中於國家或意識形態的回應，不完全相同。

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與依賴理論的影響下，布若威試圖重建馬克思主義的勞動過程理論，在《製造甘願》一書當中，他幾乎提到了上述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所有爭辯。不過，對於回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裡，工人為何不革命的這個問題，布若威跳脫了有關國家機構、意識形態與依賴理



論的爭議，延續了葛蘭西的看法，給了我們一個相當有創意的答案：「霸權誕生於工廠」。

四

一個社會學研究者、或者是一個理論典範的成功，除了個人的努力，以及科學社群內部的互動之外，也經常是整體政治經濟的「機會結構」的產物，因此，描繪某個成名社會學者的經歷，需要一種對社會學者與理論本身的知識社會學考察。但即使筆者這樣看，仍然很難減損布若威個人生命經驗的傳奇性。

1968年，布若威從英國移居中非的尚比亞，到尚比亞銅礦管理局 (Zambian Copper Industry Service Bureau) 擔任研究員 (Burawoy 1985)，並且在1970年進入尚比亞大學的社會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當時的社會研究所就是日後的羅德—李文斯頓研究所 (Rhode-Livingstone Institute)，這是葛拉克曼為曼徹斯特學派的非洲研究，所創立的重要學術機構 (Kuper 1983, Burawoy 2000)。布若威在這個英國社會人類學的重鎮裡，完成了有關尚比亞銅礦工人的人類學碩士論文，他的指導教授之一，就是前述與葛拉克曼共同開創「擴展個案方法」的維爾森。在這裡，布若威受到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完整訓練，繼承了曼徹斯特學派的主要理論關懷與研究方法 (Burawoy 1985, 2000)。此外，他還在碩士班期間參與組織尚比亞的社會學會與學生團體，在1971年的一次學運抗爭中，遭到尚比亞軍警開槍鎮壓，幸運地逃過一劫 (Burawoy

1989b: 96-7)。

1972年，布若威負笈美國，在幾位社會人類學教授的推薦下，原來想接受芝加哥學派都市社會學與民族誌的訓練，然而，芝加哥學派當時早已沒落，令他十分失望（Burawoy 2000）。幸運的是，布若威遇上了年輕的分析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教授許沃斯基（Burawoy 1979），日後以分析歐洲社會民主黨發展的《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1985）與東歐民主化的《民主與市場》（1991）等著作，聞名於世。布若威與許沃斯基建立了亦師亦友（亦敵）的關係，在後者的強烈影響下，布若威發展出他自己傾向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觀點（Burawoy 1985）。

1974年，布若威開始在芝加哥近郊聯合公司的機械工廠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由於「鴻運當頭」（stroke of fortune），讓他「命中註定」（stroke of fate）（Burawoy 2000:23）遇上了三十年前羅伊下田野的同一間工廠。羅伊的作品是最早的、甚至也可能是最詳盡的工業民族誌作品之一（Smith 2001），他本人不僅是優秀的工業社會學家，更樂於提攜後輩，完全不介意有人踏進他的田野，重新詮釋其個案，更積極提供協助，顯示出一代學者的泱泱風範（Roy 1980, Burawoy 1979, 2003a），羅伊除了工廠民族誌之外，在北卡羅來納州進行了三十年的工會研究，並於1980年辭世（Burawoy 1985）。這間工廠，給了布若威與組織理論對話的大好機會。

通常，科學史上的典範移轉不只取決於研究者的意志，關鍵性的角色常常得碰上相當好的時勢與運氣。受教於曼徹

斯特學派的要角維爾森，遇上當代最優秀的左翼政治學者許沃斯基，又得到上天保佑，重返組織理論中著名的工廠，布若威就是那個幸運兒。不過，他也相當珍惜自己的好運道。《製造甘願》一書的靈感，刺激布若威進行更龐大的工廠體制比較研究，這就是「生產的政治」計畫，這個計畫橫跨了二十年的時間，期間布若威在匈牙利的「列寧煉鋼廠」與俄國的工廠投入勞動群眾的行列，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生產的政治》（Burawoy 1985）與《輝煌的過去》（*The Radiant Past*, 1992）這兩部著作中。

就連布若威在匈牙利的工廠研究，都讓人不得不折服於他驚人的運氣與意志力。「我畢生的夢想就是在一間社會主義的煉鋼廠找到一份工作！……我猜我是世界上唯一有這種奇特夢想的人。」在紐約大學社會系的一場演講中，他這麼說（Byles 2001）。事實上，這是當時許多社會學者，像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與陳佩華（Anita Chan）等人的夢想，但儘管想要研究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工廠與農村，他們都不得其門而入，只能被迫在香港訪談中國難民。1985年的二月份，布若威興奮地跨進匈牙利列寧煉鋼廠的大門（Byles 2001），在此之前，他曾經數次前往波蘭與匈牙利，一直未能獲准進入社會主義的工廠從事研究（Burawoy 1985）。在共產主義社會研究的開創性人物伊凡·澤林尼（Ivan Szelenyi）等人的大力協助下，布若威成爲第一個在共產主義工廠裡做工的西方社會學者（Burawoy and Lukács 1992, Burawoy 2000）。

布若威在匈牙利的田野，得力於學術界同僚的幫助與冷戰解凍的大環境，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共產世界的改革

開放，迅速地導致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的崩潰。雖然布若威與他的合作者盧卡斯（János Lukács）對於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做了一些觀察，也對《生產的政治》一書中的理論架構做出修正，但隨著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列寧鋼鐵廠也面臨重大的轉型，在員工入股之後不久，於1997年私有化，賣給來自斯洛伐克共和國的一個跨國財團（Burawoy and Lukács 1992, Burawoy 2000, Byles 2001）。基於比較研究上的理由，布若威在1990年就放棄了匈牙利，前往蘇聯尋找適合參與觀察的社會主義工廠，然而他自嘲地說「悲劇——如果你願意的話，就叫它革命吧——總是跟隨我到達每一個地方」，1991年6月，布若威在俄羅斯找到可以下田野的工廠，但是兩個月之後，俄共保守派發動短命的政變，曾存在地球上五十九年的第一個共產國家蘇聯隨即解體，這家工廠就隨著經濟改革而破產，布若威的研究也無以為繼（Burawoy 2000, Byles 2001）。不過，直到1999年，布若威仍然不斷重返俄羅斯，利用短期工作機會與參訪，對經濟轉型之下的生產體制與性別議題進行研究。

「我每到一處，所有的事物就在我的面前崩潰。現在我的朋友哪兒都不讓我去。古巴？中國？他們說千萬不要，你最好是待在北極圈裡。」在貝理斯2001年的訪問中，布若威幽默地說，而且「對一個五十三歲的人來講，在工廠裡工作真的是個大問題。」（Byles 2001）不過即使如此，布若威的工廠田野經歷，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界中，已經是空前的輝煌成就。根據維琪·史密斯（Vicki Smith）針對工作民族誌研究的全面回顧，自羅伊完成著作的五十年以來，五十七本相關

著作的作者裡面，僅有布若威一人，能夠持續如此之久的工廠田野，並且曾經在三間以上，而且又是不同國家的工廠生產線裡，直接做參與觀察（Smith 2001）。

回到柏克萊，布若威開始重新整理他的社會學質化研究方法論。1988年，他帶領博士班學生進行參與觀察方法的訓練，重建「擴展個案方法」，這些成果收錄在《民族誌拓邊》（*Ethnography Unbound*, 1991）一書。而在1998年，布若威又參與了一項在巴西、愛爾蘭、匈牙利與美國等全球六個地點同時進行的人類學計畫，希望透過不同地區的個案研究，探討「全球化」的現象是否存在，從而改變了全球各地人類的時間觀與空間觀。雖然結論十分模糊，但這仍然是個有趣的民族誌寫作實驗，相關作品合編入《全球民族誌》（*Global Ethnography*, 2000）一書。布若威對曼徹斯特學派「擴展個案方法」的全面翻新，以及在《製造甘願》原序言中所提到，探討重訪其他學者田野地的方法論的論文，都是在近幾年離開工廠之後，才陸續完成的（Burawoy 1998, 2003a; b）。

除了布若威個人的執著，以及政治經濟變遷「時勢造英雄」之外，誠如許多科學社會學或者區域創新研究所指出的，科學家需要一個資訊流通的社會網絡來刺激技術創新，社會學者並不例外。就布若威的例子而言，除了芝加哥與柏克萊大學的學術資源、他在匈牙利的合作者以及「十月革命社會主義者縱隊」（October Revolution Socialist Brigade）的工人之外，美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者的網絡，是他非常重要的社會資本，其中一個就是「無胡說八道馬克思主義者社團」（Non-Bull Shit Marxist Group, NBSMG）。在《探究不平等》

(*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一書的序言中，萊特曾經簡單介紹過這個社團，其中主要的成員包括美國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或是社會民主主義學者，例如分析馬克思主義的要角羅默、埃內斯特 (Jon Elster)、許沃斯基、寫過《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書的科亨 (G. A. Cohen)、鮑理士、金蒂斯、研究封建向資本主義轉型的要角布勞納 (Robert Brenner) 等等，全部是男人，每年進行數日的內部聚會。這個網絡對於長期弱勢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男性」社會學者，起著相當重要的學術交流作用 (Wright 1994)。此外，布若威也相當提攜後進，近期的民族誌著作都是由博士班學生組成工作團隊，合力完成的。

在布若威的學術生涯裡，最值得一提的友人，應該非艾瑞克·萊特莫屬。萊特以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研究而聞名，提出了「矛盾的階級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 的概念，對中產階級進行馬克思主義的量化分析，甚至發展出十六國以上，包括台灣在內的階級結構跨國比較。兩位當代馬克思主義陣營的社會學大師相遇，又是另一段傳奇故事。

1975年，布若威還在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寫作期間，提前申請柏克萊大學的教職。一天，柏克萊一個叫萊特的博士班學生打電話給他，說芝加哥一位著名的學者寫信來毀謗他是「最糟糕的左翼極端份子」，叫柏克萊千萬不要聘用布若威。萊特叫布若威要有另謀高就的打算。這通電話三個月後，在萊特爭取下，柏克萊系上的教師與研究生爲了排除黑函的影響，組成了一個公正的審查委員會，通過布若威的聘

任案。這次審查會上，布若威第一次與萊特會面，惺惺相惜，從此成爲莫逆之交，隔年，兩人著名的論文都順利通過，取得博士學位 (Burawoy 1989b: 78)。這個故事，仍然在柏克萊的研究生中流傳，除了令人佩服萊特的勇氣之外，還呈現了1970年代美國社會學界的內部衝突與變遷：曾參與學生運動與反戰運動的新一代研究者，與學界保守勢力對抗的權力鬥爭。

「我們兩人的智識風格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他做民族誌研究，格外精細；我做量化研究，常抹煞研究主體細微、本然的面貌。他一般而言，懷疑「客觀」真理，而我依慣例在哲學上維護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的科學啓發。我們在林間溜狗時刻、莫斯科找餐廳的時分，討論這些問題……」
(Wright 1994)

萊特是當代重要的社會學量化研究學者，而布若威則是當代社會學質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兩人不但沒有質化與量化研究者之間慣有的敵意，二十餘年來還私下討論與閱讀彼此的幾乎每一頁作品，更公開在期刊上發表針鋒相對的論文，相互批評策勵，而完全無損其私交 (Wright 1994)，兩人同時也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與社會運動。這段軼聞，除了友誼令人稱羨之外，更讓我們見識到純正開闊的學術胸襟。



1974年，布若威正在工廠做工之際，學徒出身，曾有十九年職場經驗的傳奇人物布雷弗曼發表了《勞動與壟斷資本》一書，重新闡釋了馬克思的勞動過程理論。布雷吉爾曼認為，資本主義為了從勞動過程中取得剩餘價值，必須「管理」，也就是「控制」勞動過程。控制是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本質，透過壟斷資本對現代科技的佔有，管理階層得以促成「構思」與「執行」的分離，形成剝奪工人的技術的長期趨勢（Braverman 1974）。此一說法隨即引起正反兩極的反應，可惜的是，布雷弗曼在1977年的一場車禍中不幸喪生，我們無從知道他對自己理論的反思。一方面，某些量化研究企圖驗證整個美國勞動力是否真有「去技術化」的趨勢，結果多持保留的態度（Wright 1985, Block 1990）；另一方面，後繼的勞動過程研究者，也認為布雷弗曼僅描繪工人客觀存在、嚴重忽視工人主體性及勞工運動的歷史，而著手修正其觀點，其中較重要的是艾德沃茲，他將勞動過程視為勞資雙方《爭奪的戰場》（*The Contested Terrain*, 1979），是管理階層「控制」與勞工「抵抗」此一歷史過程的一系列產物，並將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工廠管理模式區分為直接控制、技術控制與科層控制等類型。

布若威的勞動過程理論，大抵就是在批判組織理論與上述的「布雷弗曼症候群」（Bravermanian）這兩種研究取向上，建立起來的（Burawoy 1979, 1985），並歷經他自己多次的修正，其主要架構，集中在《製造甘願》、《生產的政治》與《輝煌的過去》這三本書裡。對於布若威在本書已經詳加說明的部分，筆者盡量不再重複，僅就其貢獻與後來的理論發

展，扼要介紹之。

布若威對勞動過程理論的第一個貢獻，在於指出「同意」（consent，或者譯為「甘願」）的重要性。布若威認為，馬克思將勞動過程的再生產，視為競爭資本主義下，勞動市場「強迫」（coercion 或譯為威嚇）的效果，因為在完全沒有財產與其他收入的情況下，勞動力不賣出去，工人就得挨餓甚至死亡。但是在壟斷資本主義下，工人受到福利國家的基本生活保障，市場的威嚇力量日減。布若威認為，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驅動工人投入生產的力量，來自一種「志願性的服從」，也就是有意識下的「同意」，或是默默接受的「甘願」（Burawoy 1979, 1985, 謝國雄 1996）。依據布若威的說法，無論何種類型的生產體制（production regime）或者說是工廠體制，都是「同意」與「強迫」的組合，當強迫的力量佔上風時，他稱之為「專制體制」（despotism），當「同意」壓過「強迫」的力量時，稱之為「霸權體制」（hegemonic regime）（Burawoy 1979: 27, 194）。

布若威對勞動過程理論的第二個貢獻，在於區分出「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與「生產時的關係」（relations in production）或「生產中的關係」（production relations）。生產關係，指的是某個生產模式中針對剩餘價值所發生的剝削關係，而生產時的關係，則是指在勞動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社會關係，例如同仁之間的關係，或是上司與下屬之間的關係。布若威認為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不僅透過生產來佔有剩餘價值，更利用各種生產時的關係（製造同意的機制）來掩飾剩餘價值，因而，其特徵正是在同一過程

中，取得並且同時掩飾了剩餘價值（Burawoy 1979）。布若威批評布雷弗曼未能認識到泰勒主義在理論上與實踐經驗上的巨大落差，所以誤解了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本質，勞動者徹底的去技術化，將無法隱藏剩餘價值，導致階級衝突加劇，而技術完全由工人控制，則無法取得剩餘價值，因此，資本主義勞動過程要掩飾同時取得剩餘價值，工人不可能完全去技術化或掌握技術（Burawoy 1985: 49）。

在《生產的政治》中，布若威把《製造甘願》一書裡勞動過程「行動」與「關係」的面向，進一步區分為「生產時的技術關係」與「生產時的社會關係」。布若威認為，布雷弗曼有經濟決定論與科技決定論的傾向，是因為忽視了生產時的社會關係，並且誤解了生產時的技術關係，前者導致他的理論中完全不見工人的主體性及生產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面（Burawoy 1985: 35-6）。生產時的技術關係或者說是科技的進展，則與生產時的社會關係有關，並受到生產關係的「污染」與其他社會力量的形塑，布雷弗曼則未能指出這一點（Burawoy 1985: 51-2）。

布若威的第三個理論突破，就是重新定義了「政治」的概念，並用之於生產領域。布若威將政治定義為在某一特定領域內，針對某一組社會關係的鬥爭。「生產的政治」，就是在生產領域內，針對「生產時的關係」所展開的鬥爭。國家政治，或者說是總體的政治（global politics），則是調節各領域鬥爭的「政治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olitics），國家機構所確保的，是其他領域的社會關係與社會機構的再生產，在經濟領域，確保的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Burawoy 1985: 254）。值得一提的是，布若威在《生產的政治》一書中，認為應當跟隨韋伯，將國家定義為某一疆域內壟斷武力的組織，而放棄了《製造甘願》的「內部國家」與「外部國家」的區分，代之以「生產的政治」與「國家政治」的區分（Burawoy 1985: 11）。

在重建「政治」的概念之下，布若威把結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架構引進生產領域，將生產體制視為一個由經濟（物品的生產）、政治（社會關係的生產）及意識形態（對於社會關係的實踐經驗的生產）「多元決定」的領域（Burawoy 1985: 39），其中製造甘願的機制，包括了勞動過程作為一場遊戲，而產生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效應，以及生產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機構，也就是勞資集體協商（本書中的內部國家）與內部勞動市場，這些機制，組成了調節生產政治（生產時的關係及其衝突）的生產體制。布若威指責布雷弗曼與艾德沃茲等人，未能將勞動過程本身，與生產的政治機構區分開來，但後者是製造甘願、區分專制與霸權體制歷史分期的重要機制，因此，艾德沃茲關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三種控制類型的歷史分期，欠缺理論邏輯上的依據。（Burawoy 1985: 125）。

關於生產體制中這些政治與意識形態機制的運作與歷史變遷，本書的民族誌就是最佳的說明。然而，一旦結構馬克思主義所謂「最終決定」的經濟領域，本身也是由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多元決定的，那麼，生產體制的類型、與資本主義的延續或崩潰，又取決於何種歷史因素呢？

布若威認為生產體制的型態，主要取決於國家政治與生產政治之間的關係。在《生產的政治》一書中，布若威提出

「國家對工廠體制的干預」以及「國家機構與生產機構之間的制度關係」這兩個面向，來討論國家政治與工廠體制之間的關係與分類。國家機構與生產機構之間有「分離」與「融合」兩種制度關係，在資本主義下，國家機構與生產機構是分離的，前者要佔有剩餘價值，就必須向後者課稅。在社會主義下，國家機構與生產機構是融合的，國家直接取得並且分配生產剩餘。至於國家對工廠體制的干預方面，則區分為「間接」與「直接」兩類（Burawoy 1985: 12）。透過上述四種情況，布若威區分出資本主義的市場專制體制與霸權體制，以及社會主義的官僚專制體制等生產體制的類型。

在競爭的資本主義下，國家對工廠體制的干預是間接而無力的，生產體制基本上是專制的，其分類取決於生產工具的有無（如外包制）與勞動市場供給等因素（Burawoy 1985: 87-91）。在壟斷資本主義下，國家則主要直接對勞動條件（管理權的範圍）與工人的社會福利（勞動力的再生產）兩方面進行干預，生產體制基本上是霸權式的（Burawoy 1985: 125-6），但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各國中，國家對管理權的直接限制與對勞動力再生產的支持程度，差異極大。在瑞典，國家深入干預勞動條件，而且建立了完整的社會福利體系；英國雖然社會福利完整，國家卻很少干預勞動條件；美國的福利制度殘缺，但是國家對於集體協商與或勞資爭議，經常強力干預；日本則是低度福利，勞動條件也較差，最近似於專制的家父長主義（paternalism）（Burawoy 1985: 137-47）。

布若威對社會主義工廠體制的分類，則經歷過重大的修正。在《生產的政治》一書中，布若威區分了「官僚專制體

制」與工人「集體自我管理」兩種類型，前者是在國家直接干預生產時建構出來的，以匈牙利工廠民族誌為例的典型，後者則是國家不直接干預生產體制下，所虛構出來的一種理想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Burawoy 1985: 12-3）。布若威認為官僚專制體制的形成，主要是由於科爾奈（J. Kornai）所謂「短缺的經濟」（shortage economy）造成的。科爾奈的論點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系，在缺乏價格信息的指示下，經常無法反映生產與消費的需求，而生產單位的成本則不受市場拘束，形成「軟性的預算限制」（soft budget constraints），與完全不同的經濟理性。一方面，生產單位為了擴大政治影響力並且減少生產的壓力，會浮編預算擴張人事，並且在計畫目標上跟中央計畫官僚討價還價，另一方面，計畫經濟的資源配置僵固而難以協調，而形成投資過剩、生產不足與原料供需失調的現象（Kornai 1992），這導致了依據計畫週期與物料短缺而發生的週期性趕工、以及生產管理上的專制，由於黨與工會都負擔了管理與榨取生產剩餘的功能，而形成了黨、工會與經理人三位一體，與領班合作壓迫工人的「官僚專制體制」（Burawoy 1985: 159-64），其中布雷弗曼所謂的「構思」與「執行」的分離、去技術化的趨勢，是更加明顯的。至於布若威「集體自我管理」的概念，則是建立在1980年代波蘭共產黨對團結工聯抗爭的讓步，以及對南斯拉夫與古巴經濟實驗的樂觀評估上，布若威認為社會主義下的工人，有機會爭取到對勞動過程更大程度的控制（Burawoy 1985: 200-2）。

社會主義的生產體制是否與資本主義類似，會有從專制到霸權的轉型？在《生產的政治》一書中，布若威似乎期待

東歐的民主化而非經濟改革，能夠使官僚專制體制讓位給工人集體自我管理，然而事與願違。在《輝煌的過去》一書裡，布若威與盧卡斯將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廠體制，區分為「官僚專制體制」與「官僚霸權體制」兩個時期，後者是修改自《生產的政治》一書裡，引用史塔克（David Stark）與賽貝爾（C. Sabel）所謂社會主義核心部門的「官僚協商體制」（bureaucratic bargaining regime）（Stark and Sabel 1982, Burawoy 1985: 16）。由於匈牙利在東歐率先實施經濟改革，第二經濟部門成長迅速而形成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加上福利制度由生產單位轉向國家承擔，匈牙利國營工廠中，經理人與黨的強制力，在1980年代嚴重衰退，迫使生產單位實施類似資本主義霸權體制的分紅等獎勵制度，讓同意大過了威嚇，而造就了「官僚霸權體制」（Burawoy & Lukács 1992: 32-4）。

除了資本主義的「市場專制體制」、「霸權體制」與社會主義的「官僚專制體制」與「官僚霸權體制」之外，布若威在《生產的政治》重提了本書中的尚比亞案例，稱之為「殖民專制體制」（colonial despotism），並且一方面批評世界體系理論的經濟化約論與技術決定論（Burawoy 1985: 247），另一方面指責「生產方式連屬」的觀點，僅分析生產關係的層面，而忽視了生產時的關係與勞動過程的技術安排（Burawoy 1985: 212）。經歷過殖民初期原始積累的時期之後，在殖民國家所擁有的尚比亞銅礦中，白人經理人對非洲工人實施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的壓迫，也就是內部的種族主義，勞動市場的壓力與工作現場的安排顯然是專制的。而在後殖民時期，雖然白人經理暫時掌握了技術並持續其支配，但非洲工

人的抗爭與新民族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使得內部的種族主義衰退，並可能轉向「官僚專制體制」（Burawoy 1985: 248）。此外，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金融體制走向去管制化，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陷入危機，出現資本外移與核心的邊陲化現象，也就是我們今日所熟知的「全球化」，布若威認為，此一衝擊使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去除對勞動過程的管制與社會福利的支持，讓原有的「霸權體制」轉型成彈性化的「霸權專制體制」（Burawoy 1985: 152, 264-5）。

透過同意與強迫的比例區分專制與霸權體制、生產關係與生產時的關係的劃分，以及國家政治與生產體制的關係，布若威建構出貫穿《製造甘願》、《生產的政治》與《輝煌的過去》這三本書的主要分析架構，試圖澄清各種生產體制之間的關係與歷史變遷。然而，這些生產體制的差異又是如何演變出來的？其歷史規律存在嗎？布若威的答案指向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對特定個案與歷史變遷的社會學分析（Burawoy 1985: 259），例如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會的組織、機械化與從競爭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的先後順序決定了生產體制的演變。工會組織先於機械化，則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控制較強，容易形成集體協商與福利國家政策，也就是促成霸權體制。工會組織先於壟斷資本主義，則競爭部門也會組織化，不易出現雙元的勞動市場。國家政治的多樣性，與階級鬥爭、資本競爭甚至國際勞動分工在歷史上的組合關係，也都影響工廠體制的演變（Burawoy 1985: 66-8）。不過，布若威的這些推論都十分簡化，經驗證據有限，頂多只能說階級鬥爭仍然是影響國家政治與生產政治的重要因素而已。



對於變遷的動力與歷史規律的問題，布若威的第二點看法，指向對馬克思主義決定論傾向的徹底批判。生產體制是階級鬥爭與社會各領域鬥爭的結果，同時也是未來鬥爭的限制，就連生產力本身，也是一種「政治」。布若威自己十分清楚，他的論點推演到最後，必然要顛覆結構馬克思主義者不時遭人嘲笑的「最終決定於經濟」的論點，也就是，顛覆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與修正主義者賦予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優先性、以及階級鬥爭與生產方式演進的歷史規律。如此一來，也就拿掉了工人階級必須成為革命先鋒的沉重負擔（Burawoy 1985: 259）。

六

當代社會學的方法論源流，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涂爾幹與韋伯（Giddens 1976）。與這三大社會學家相關的實證主義、詮釋學及批判理論傳統，構成了社會學方法論上漫長爭議的主軸之一（Habermas 1971）。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美國社會學界，現代化論、結構功能論成為理論主流，實證主義與統計研究，則成為主要的研究方法（Burawoy 1998）。1960年代末期，此一方法論傳統面臨了一系列挑戰。首先是民權運動、越戰與經濟赤字對美國霸權的政治經濟衝擊，其次則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本身面臨重大的挑戰，並且影響了社會科學，最後，則是來自社會學與人類學界對方法論的自我批判。

在科學哲學方面，卡爾·波柏（Karl R. Popper）最早在

1934年提出了反歸納法與否證論，對於歸納邏輯的效力提出質疑。波柏認為，由於在科學研究者所觀察的經驗與科學理論之間，並沒有邏輯上的關係，歸納法所得到的觀察，並不能驗證普遍的理論，因此，科學理論只能夠被否證。波柏認為，科學是一種冒險事業，透過大膽猜測、試驗與否證的循環過程，科學家能夠從錯誤中學習，雖不可能得到真理，卻能逼近真理（Popper 1963, 紀樹立編 1987, 林正弘 1988）。

波柏與孔恩（Thomas S. Kuhn）的爭論，成為科學哲學發展的重要轉折。孔恩的科學哲學跳脫了知識論上的邏輯爭辯，而由科學史中得到更多的靈感。他將科學的演進區分為幾個階段的循環，包括派系林立的前科學、常態科學或典範（paradigm）、異例（anomaly）逐步發展成科學危機，最後經歷科學革命並且建立新的典範。一個典範包括了下列五個要素：（一）明確的定律或理論，（二）適用理論的範圍，（三）研究或實驗的工具，（四）指導研究工作的形上學預設，如宇宙由粒子構成，或文化是一種社會事實。（五）方法論的規則，這與形上學預設息息相關，如自然現象可以化約成粒子的運動。典範有時也被拿來指稱經典研究或著作，透過學習或模仿這些經典，研究者才能深刻體驗某個常態科學典範的基本精神與實踐方式。此外，孔恩強調不同的典範其實是不同的世界觀，在邏輯上可能並無錯誤，經驗上無法解釋的異例也可能被長期忽略，不必然導致科學革命；科學危機與典範移轉，是在某種社會或政治、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因此，他強調典範之間的不可共量性（Kuhn 1962, 林正弘 1988）。

波柏與孔恩的科學哲學，影響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爭辯。首先，波柏對於歸納法的批判，挑戰了量化研究的效力。其次，典範、異例與科學革命的觀念，也被用來解釋社會科學的理論進展（Giddens 1976）。在對戰後美國社會學主流的批評之下，許多學者轉而強調社會學與社會行動者的「反思性」（reflectivity）（Habermas 1971, Giddens 1984,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與無所不在的、滲透於社會科學知識之中的權力關係（Foucault 1977），在人類學界，則是對傳統的民族誌寫作方式及背後的知識預設提出質疑，檢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要求對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徹底批判，並訴諸民族誌寫作風格的多元化實驗（Marcus and Fisher 1986）。

布若威對於葛拉克曼「擴展個案方法」的重建，除了對質化研究所面對的質疑，做出回應之外，也吸收了科學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方法論的進展，強調社會學的詮釋學與批判面向，進一步提出了「反思科學」（reflective science）的概念，並延伸到人類學「反思民族誌」（reflective ethnography）的討論上。

布若威的思想脫胎自兩場方法論上的筆戰，第一場論戰，是布若威與萊特在《階級的辯論》（*The Debate on Classes*, 1989b）一書中針對馬克思主義與科學性質的爭論，第二場論戰，是布若威對史卡區波（Theda Skocpol）「歷史比較方法」的批判（Burawoy 1989a），布若威在方法上一向強調研究者的介入與歸納法的缺陷，至於他對擴展個案方法的延伸，前後經歷十餘年，每篇作品所強調的重心亦不相同，不過大致來

說，所針對的不外乎是理論與質化研究個案之間的關係、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並進一步檢討社會科學的本質。最後，布若威也重新詮釋了本書幸運地重訪羅伊的田野一事，在方法論上的意義。

在1991年的《民族誌拓邊》導言與結論中，布若威首先處理了民族誌個案研究與社會學理論之間的關係。面對質化研究難以一般化、以及僅能探討微觀的人際互動這兩種質疑，布若威區分了社會學理論「微觀（micro）」與「鉅觀（macro）」的分析層次，以及個案研究屬於社會情境中「特殊的」與「普遍的」重要性。布若威批評葛芬格（H. Garfinkel）的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與象徵互動論的社會學研究，完全否定了鉅觀層次的社會現實與分析，而紀爾茲（C. Geertz）的深描法（thick description）或者稱之為「詮釋個案方法」（interpretive case method），則是在寫作策略上，消融了鉅觀與微觀的分析層次而不加區別，例如把巴厘島的鬥雞當成「典範性的事件」（paradigmatic event），以此來解釋印尼的政治文化，造成把個案過度推論與難以否證的困境。另一方面，葛拉舍（B. Glaser）與史特勞斯（A. Strauss）所發展的「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則是以田野中累積的概念來建構新理論，強調社會情境的相似性，並且以歸納法的方式來逐步建構出鉅觀的分析概念，對紮根理論來說，個案在理論中的意義，是對於普遍現象的一個例證。布若威從兩個方面來批評紮根理論。首先，布若威引用波柏的反歸納法，指出紮根理論模仿統計學方法來建構理論，難以驗證或否證因果關係。其次，布若威批評紮根理論把個案當作理論一般化的例



證，反而喪失了個案的社會脈絡與歷史性，同時削弱了個案的社會意義與重要性。

布若威引用了孔恩引發科學革命的「異例」概念，來捍衛質化研究個案的價值。他認為，個案研究不需要具備普遍性，而其價值正在於其歷史與社會脈絡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將微觀與鉅觀的分析層次區分開來，並不代表個案只能討論生活世界裡的互動，或是只能透過歸納法來累積概念與理論，恰恰相反，個案研究可以深化或否證鉅觀理論的因果推論。在此，參與觀察法形成了雙重的「對話」(dialogue)關係，一方面，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對話關係，另一方面，是個案研究與既有理論的對話關係。這裡布若威引用紀登斯「雙重的詮釋」概念(Giddens 1976)，但進一步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以及科學家與科學社群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動態發展(Burawoy 1991)。

在1998年的同名文章「擴展個案方法」中，布若威進一步運用了擴展個案方法的策略，也就是，拿「擴展個案方法」當作一個研究方法上的「異例」，來否證或重建主流的「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方法論。此外，本文也進一步深化了對於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權力關係的探討。

布若威跟隨波柏，將科學定義為「對經驗現象可否證的(falsifiable)與可一般化的解釋」，依此區分了兩類的社會科學，第一類是所謂的「實證科學」，第二類他稱之為「反思科學」。實證科學將社會視為被研究的客體，研究者應該盡量避免干擾客觀的資料來源；而反思科學則強調研究者的介入，以及被研究者的主體性，將社會研究視為具有反思性的多重

對話過程。在方法論層次，實證科學慣用調查與統計方法，而反思科學慣用擴展個案方法。在研究技巧的層次，實證科學慣用短時間的問卷訪談，反思科學則慣用研究者長期介入的參與觀察法。最後，就社會研究的生產模式來看，實證科學注重「程序的客觀性」，而反思科學注重「鑲嵌的客觀性」，前者是構思與執行分離，理論家與調查人員分離的「工業模式」，後者則要求研究者就是參與者，是「工匠模式」的知識生產。

實證科學的程序客觀性，建立在四個評斷基礎(4Rs)上，第一，是避免研究者干擾研究對象的「反應性」(reactivity)，第二是由被研究者取得資料品質的「可靠性」(信度，reliability)，第三是研究過程的「可重複性」(replicability)，第四是研究抽樣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這四個原則，由於社會調查與訪談必然處在某些社會情境的脈絡下，必須面對四種不同的「脈絡效應」(context effects)。第一種是「訪員效應」(interview effects)，由於訪員的性別、族群等因素導致受訪者改變回答，第二種是「受訪者效應」(respondent effects)，亦即受訪者的特質與生命經驗所造成的影響，第三種是「田野效應」(field effects)，指同一受訪者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會給訪員完全不同的答案，第四種「情境效應」(situation effects)，也就是抽樣過程中無法針對母體的社會情境做分層的困難。這些效應，都會對實證科學下的抽樣調查造成嚴重的偏誤，但是對反思科學來說，這些效應恰恰是理解社會關係的原則。

對實證科學而言，訪員的身份特質影響受訪者的回答，是一種干擾，對反思科學而言，研究者「介入」(intervention)

的效應是必然會發生的，介入本身會擾亂、同時展現社會秩序本身的運作。參與式觀察，需要研究者以較長時間參與社會「過程」(process)，因而可以理解不同生命經驗下以及社會情境下，受訪者對問題的反應與詮釋。而所謂的田野效應，來自於田野在地的政治經濟「結構性」(structuration)，研究者不但不應排除這些自主的動力，更應該以田野中的社會過程來解析其中運作的社會力。最後，由於獨特的社會情境已經被參與觀察者考慮在分析之內，個案雖然不具備代表性或一般性，但可以用來確認或否證原有的理論，這就是個案對理論的「重建」(reconstruction)。

介入、過程、結構性與理論重建，是反思科學的四項原則。實證科學的原則是追求「客觀性」，反思科學卻是追求上述四種「對話」。反思科學的方法，亦即擴展個案方法，要求的是將觀察者擴展為參與者，擴展並比較不同時空脈絡下的觀察結果，擴展我們對社會過程與外部力量之間互動關係的理解，並且擴展理論本身。其中理論是研究的核心，引導研究者介入、對過程的理解與結構的分析。然而，這四種對話，同樣必須面對四種「權力效應」(power effects)。第一種權力效應，是優勢的訪員對受訪者的「支配」(domination)。第二種則是社會情境在穩定的利益結構下，對受訪者「消音」(silencing)的效果。第三種權力效應是「客體化」(objectification)，也就是在研究影響社會過程的外部力量時，將這些外在的社會結構視為自然與必然的現象。最後一種權力效應是科學理論的「常態化」(normalization)，是指建構理論與研究程序時，對資料或研究對象的扭曲 (Burawoy

1998)。然而，要如何避免這四種權力效應呢？布若威的建議是正視社會研究的限制，並且持續反思與「對話」的原則，針對作品與被研究者反覆溝通以避免「支配」、激發隱藏在社會情境中的「異議」(voice)來反抗「消音」、注重過程與結構之間的相互影響以避免「客體化」，並積極參與科學社群、研究者還有被研究者之間的理論爭辯來免除「常態化」(Burawoy 2000)。

最近的論文〈重訪田野：反思民族誌的理論題綱〉(Revisits: An Outline of A Theory of Reflexive Ethnography, 2003)，布若威終於兌現了《製造甘願》原序裡頭的諾言：他應該為自己重返田野的民族誌研究，提出一個方法論 (Burawoy 1979)。所謂民族誌意義上的重訪，指的是一個參與觀察研究者，與另一個參與觀察研究者，在不同時間對同一田野的比較。這種比較必有差異，但差異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是知識典範的問題，也就是，研究者用不同的理論去看相同的現象，得到不同的結論，布若威稱之為「建構主義的解釋」(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這經常導致對既有理論的否證與重建。布若威指出福瑞曼 (D. Freeman) 的《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1983)一書重訪薩摩亞，對米德得自鮑亞士的文化決定論，提出全面性的批判，是否證原有理論的第一類重訪，可惜並未樹立新的典範，使得本書爭議不休，直到福瑞曼也在2001年作古為止。而維娜 (A. Weiner) 在近六十年後重訪初步連群島馬林諾斯基的田野地，則在女性主義刺激下，研究了女性在庫拉交換與喪禮中所扮演的角色，改寫了父權視野下的《南海舡人》，屬於重建理論的第二



類重訪。布若威認為，人類學的重訪大多是「建構主義」，著重理論典範的視角，而有忽視實際變遷與歷史性的傾向。

第二個對重訪時差異的解釋，是認為先行者的研究，無論其理論視野如何，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描述，大致上仍是可信的，但是在數十年後，新的研究者來訪時，社會現實已經有重大的改變。布若威稱之為「現實主義的解釋」(realist explanation)，並以都市社會學者卡普婁(T. Caplow)在約五十年後重訪1927年藍德(Lynd)夫婦著名的「中城」(Middletown)，以及莎朗·赫金森(S. Hutchinson)重訪伊凡普理查(Evans-Pritchard)之後歷經半世紀以上戰亂的南蘇丹弩爾(Nuer)部落等為例，來說明兩類「現實主義的重訪」，前者希望找出中城田野「內部」變遷的過程，是「經驗主義」(empiricism)式的第三類重訪，後者則研究兩個鄰近的弩爾部落，是否維持反映其親屬結構的牛隻交換，希望找出影響兩個部落抗拒或適應變遷的「外在」政治經濟動力，布若威稱之為「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式的第四類重訪。布若威認為，社會學上的重訪多半是現實主義的重訪，著重現實社會的歷史變遷，卻忽略理論視野上的重建。

當然，所有重訪或多或少都有上述四種因素，只是強調的面向不同，布若威用《製造甘願》為例，指出參與觀察者「介入」時的工作位置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內部生產「過程」與規則的循環，與資本主義市場由競爭到壟斷、工會組織化之下的集體協商、國家介入等外部「結構性」力量的影響，以及由於人際關係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典範不同，造成理論的「重建」。最後，布若威提出了五種類似重訪的研究情境，包

括閱讀先前田野筆記的「滾雪球式重訪」、長期重返同一田野地的「穿透式重訪」、針對量化或其他研究方式，對同一個案或理論問題的「詮釋式重訪」；與參考口述歷史與文獻的「考古學式的重訪」，最後還有將作品回饋給報導人檢視的「告別式的重訪」。布若威指出，這五種擬似重訪的情境，與前述四類嚴格定義下的重訪一樣，都是一種跨越時空的「對話」，包括他所謂反思科學的「介入」、「過程」、「結構性」的因素，並刺激研究者進一步的理論「重建」，布若威認為這就是「反思民族誌」研究的重要意義(Burawoy 2003a)。

布若威大膽提出的「反思科學」的概念與「反思民族誌」的綱要，仍然是發展中的方法論與認識論觀點，或許不成熟，但已經引發社會學界的爭論。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來的作品中，布若威回應了許多對他早年著作的攻擊，但坦承《製造甘願》這部作品，有將外部力量與結構，特別是把資本主義國家與市場「客體化」的嫌疑，未能注意到霸權體制的矛盾，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市場變遷之間的互動，或許因此，布若威回顧葛蘭西的國家理論與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的市場理論，企圖彌補這個早期研究的缺陷(Burawoy 2000, 2003a, b)。

七

布若威的理論與方法，啟發並影響了不少有關台灣、香港與中國的工業社會學著作，包括筆者與本書幾位譯者的論文。不過，就理論上的爭辯來看，最重要的，應該是布若威

與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的爭論與後續的發展。

布若威有關社會主義工廠與資本主義工廠的比較，也就是《生產的政治》，出版於1985年，主要的資料來自美國與匈牙利的工廠民族誌，魏昂德的作品則於1983年首度發表在期刊，並在1986年改寫成《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與權威》，這個書名是向班迪克斯（R. Bendix）與喬威特（Kenneth Jowitt）借來的，很顯然，魏昂德對中國工廠權威的探討，延續了喬威特對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治文化的經典研究，是對韋伯、班迪克斯的「傳統型支配」的一種反思。本書出版之後，隨即成為共產黨工廠與政治研究的權威著作。

魏昂德認為，共產黨社會的生產單位中，由於勞資關係並非一種市場關係，國家透過工廠對工人進行政治統治，而形成三種「組織性的依附」（organizational dependence），分別是工人對生產單位的經濟依附，工人對黨與經理人的政治依附，以及工人對上司與領班的人身依附，在這三種依附之下，形成了「新傳統主義」的制度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包括了恩侍關係（patron-client network）或所謂「實用的私人關係網絡」、工人的縱向分裂（派系主義，factionalism）與積極份子跟一般基層工人群眾的對立，以及不算嚴重的貪腐現象，例如送紅包、走後門等等。魏昂德認為，中國工廠裡這種制度文化，是在中國革命之後，黨國組織起工廠時，被刻意延續甚至開創出來的「新的」傳統（Walder 1986）。

魏昂德進一步闡述，共產黨工廠裡的制度與文化核心，

是「政黨侍從主義」（party clientelism）的網絡，這種網絡既公且私，既形成了監控與動員工人的黨國網絡，又是實用的私人關係，使工人運用這種網絡來追求私人利益。一方面，魏昂德反駁了政治學上的極權主義理論，誤以為共產社會的本質只是高壓控制，相反的，共產黨也必須製造「甘願」，讓工人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志願服從黨的領導。另一方面，魏昂德也認為多元主義理論不適用於共產社會，因為多元主義以團體或階級為分析單位，區分公共與私人領域，而無法處理施恩者與侍從者之間公私不分的網絡關係。魏昂德對「同意」（consent）提出了更複雜的觀點：

任何類型的權威中最令人費解的部分，在於一種模糊的『同意』：即志願性或習慣性服從的因素。任何類型的權威都包括人們的默認（consent），從而轉化成道德上的接受。……我將同意視為一個比較不一致的概念，這個概念發自於習慣、出於利益上的算計或道德上的認同等等。換句話說，人們的趨向是各式各樣的，這些不同的社會關係與相伴而來的趨向所形成的結構，或多或少給某些權威提供了穩定性。我將這種結構稱之為權威的制度文化——這個總括性的概念包括了種種定義『同意之結構』的情況。（Walder 1986: 23-4）

在布若威數次到匈牙利的「列寧煉鋼廠」下田野的期間，魏昂德的著作得到美國社會學界的讚揚，甚至中國學者對他的解釋也深感贊同。然而，布若威與盧卡斯對此不以為然。他們依據匈牙利工作現場的經驗，提出了幾點質疑。首先，他們批評魏昂德在缺乏經驗證據的情況下，宣稱新傳統



主義的模式可以解釋所有共產國家的勞動過程。其次，布若威批評魏昂德忽略了資本主義工廠中類似侍從主義的現象，比如工人攀附領班與主管的情況。布若威甚至諷刺地說，「美國的工廠體制比匈牙利的工廠體制，更接近他（魏昂德）的模型（新傳統主義）。」（Burawoy and Lukács 1992: 31）依此看法，布若威認為魏昂德所研究的「新傳統主義」現象，與他自己的「官僚專制體制」是一樣的。湯普生（Paul Thompson）與史密斯（C. Smith）並不認同這種說法。他們認為，布若威與魯卡斯透過抽象的理論演繹社會主義勞動過程的特質，卻忽略了計畫經濟的多樣性、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與各國歷史的特殊性，湯普生與史密斯還特別指出，布若威的模型難以掌握中國的工作現場（Smith and Thompson 1992: 7-8）。

魏昂德強調中國的黨國機構，在革命後由上而下重建了工人階級，並創造出工廠裡的派系鬥爭，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則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對此提出質疑。在《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1993）一書中，裴宜理對於湯普森（E. P. Thompson）《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強調工人階級覺醒與團結文化的形成的看法，提出了兩個修正；一方面，她認為各種過去被研究者認為分化工人階級的傳統因素，如家庭與地緣關係、性別與種族等等，在中國工人對資方的抵抗中，起著團結工人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在研究範圍與方法上，相對於湯普森將英國各種爭取政治自由與平等的抗議活動，納入工人史的範圍，她則集中討論狹義的工人抗議，特別是重視其中最激烈的、公開的與集體的形態：罷工。裴

宜理將中國革命前影響罷工的政治因素，區分為三類：地緣的政治（politics of places）、黨派的政治（politics of partisanship）與「生產的政治」。其中，生產的政治所指的是在當時上海的煙草、紡織與運輸等幾類重要製造業中，技術工人、半技術工人與無技術工人之間在工作現場內外的區隔。由於當時的中國工人依賴擬似血緣與地緣關係進入都市與工廠，特別在上海，親共產黨的江南籍的工匠行會技術工人，與北方來的半技術機械工人形成明顯的隔閡，國民黨就利用青幫與洪門等幫會組織，滲透工會並為北方工人介紹工作，兩黨在原有的生產政治區隔上，建立起黨派鬥爭的基礎。裴宜理甚至認為，1956-57年百花齊放的罷工潮、文革時期以國營老工匠為主的保守派紅衛兵，與來自北方低技術合同工為基礎的革命造反派的激烈鬥爭，有歷史上的延續性（Perry 2002），絕非魏昂德所言，是戰後才被政黨侍從主義切割與引發的（Perry 1993: 253）。表面上，裴宜理直接引用了布若威「生產的政治」的概念來回擊魏昂德，實際上，她所談的卻是工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建構出來的「技術」水準與團結文化之間的關係，而不關心布若威所建立的工廠體制的類型學，並且，裴宜理對魏昂德「新傳統主義」式的、黨國由上而下動員工人的看法，僅僅是程度上的質疑。因此，筆者將裴宜理的研究架構，視為調和魏昂德與布若威兩人的理論關懷的一種企圖。

隨著東歐共黨政權與蘇聯的瓦解，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學者的研究重心轉向經濟轉型，對已經消逝的社會主義工廠究竟是怎麼回事，也似乎不那麼感興趣了。中國似乎迅

速地擁抱了資本主義，台灣、香港資本與跨國企業的鉅額投資、中國鄉鎮企業驚人的崛起與迅速的私有化，以及個體戶與私營企業的發達，逐漸瓦解了原有的人口管制，並且創造出分化的勞動市場（吳介民 2000, 陳志柔 2001, 邊燕杰 2002）。許多研究者與人權團體指出，中國私營部門的勞動條件對工人非常不利，有趣的是，多數研究都沿用了布若威的概念，將中國私營企業的勞動過程稱之為「專制體制」（Lee 1995, 1998a, 夏樂祥 1997）。對於轉型期的中國國營企業的研究，包括魏昂德本人的作品在內，則指出改革開放前的「新傳統主義」正迅速衰退（Walder 1989; 1994, Chan 1993, Zhao and Theo 1995, You 1998, Lee 1998b, Mok and He 1999），但是就筆者所知，在營運良好的重點國有集團企業中，新傳統主義與政治權力仍然是活躍的。至於鄉鎮集體企業的工作現場，由於某種進入障礙，加上迅速地私有化，針對勞動過程詳細的民族誌研究十分少見。筆者認為，裴宜理對於黨派政治、地緣政治與生產政治的討論，雖然是針對國民黨統治期間的工人史所設計的研究架構，但是對於討論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工廠來說，仍然富有啟發性。我主張在國營集團企業、鄉鎮集體企業，與私營企業中，「黨國政治」、「血緣與地緣政治」以及「生產的政治」以不同的方式與比例組合起來，創造出經濟轉型期中國工作現場的多樣面貌。這也顯示，布若威的生產政治理論，對中國工廠研究來說，仍富有深入討論的價值。

台灣的勞動過程研究，是在國民黨威權體制鬆動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希望對被誇大的「台灣奇蹟」進行社會學的批



判與除魅，而發展出來的，其中對台灣活躍的中小企業外包網絡的探討，受布若威的理論影響甚深。謝國雄在〈黑手變頭家〉一文中，指出台灣的產業零細化與勞動者兩極化的趨勢並存，而黑手變頭家（工人自行創業成為中小企業主）的現象，是勞動者抵抗無產化的策略之一。在台灣，零細化的產業結構與普遍的外包制度，造就了多樣化的工作內容，提供了黑手變頭家的機會，而這些小頭家對自己階級身份的認知，則十分混亂。工人向上流動成為小頭家的可能性，被當作資本家懷柔工人的工具，用來製造工人對資本主義的共識（consent）（謝國雄 1989b）。謝國雄將外包制度稱之為「網絡式的勞動過程」，是資本主義工廠體制的延伸，外包關係是資本主義勞資關係的一種變形，家庭代工是隨機化的薪資勞動，黑手變頭家則是製造共識的機制（謝國雄 1989a, b, 1991, 1992）。在《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1996）一書，謝國雄進一步探討台灣人的「勞動觀」，他認為在台灣極端市場化的計件工資制度下，形成了一種近似純粹買賣勞動的「做件意識」，這些意識形態效應包括了（一）擬似小頭家意識、（二）純勞動意識、（三）虛擬自由意識以及（四）計件工混淆的階級意識。然而，在計件工資「彈性分批滑落」的情況下，以及勞資爭議發生時，外包制度做為一種勞資關係的變形、以及計件工資作為計時工資的變形，就會被揭露出來。同時，謝國雄跟隨布若威，認為台灣的勞動體制近似所謂的「市場專制體制」，或是可以反過來說，是一種被雇主建構出來的「專制市場體制」，因為台灣的勞動市場未必供給過剩，但國家的缺席與雇主的專制，可以創造出一個高流動性的勞



動市場，從而壓低工資與生產成本（謝國雄，1996）。

相對於謝國雄的研究，柯志明的《台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例》（1993）則由農民與小商品生產方式的研究取向入手，探討小商品生產與市場結構轉變的關連性。柯志明認為，過去學者在解釋簡單商品生產方式時，常著重在農民經濟的生計邏輯、血緣與地緣關係的作用，忽略了逐漸普及的資本主義薪資勞動與市場結構變遷的影響。在1980年代以前，五分埔的成衣業多是彰化地區的城鄉移民創業，在面對割喉式的削價競爭時，採取了類似農民經濟的生產邏輯，形成經濟互助的網絡，但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所謂「搶時機頭」的生產時期，廉價成衣市場上的流行取向與割喉式的削價競爭，迫使五分埔引進代工與資本主義式的勞資關係，形成多種勞動組織的結合，其中代工的計件工資並不低於廠內雇工。五分埔的外包代工網絡並不是為了壓低工資或製造甘願、而是為了因應快速多變的流行市場，而建立起來的。這種彈性生產組織，不是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殘餘，而是近年來的新發明，相對的，資本主義大量生產或許反而難以適應成衣市場的變遷（柯志明1993）。謝國雄與柯志明兩位研究者，對於台灣中小企業與外包網絡的性質，看法並不相同，前者傾向批判「市場專制體制」的剝削，並且從台灣社會的勞動觀下手，對「做件意識」尋求外來文化上的解釋，後者則可能給「彈性生產」的觀點提供了佐證，此一爭論甚有理論意義，亟待後繼研究的釐清。

相對於中國工廠研究針對黨國介入與轉型的爭論，台灣

有關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研究，更大量引用了布若威的理論。本書譯者之一的張烽益，研究台灣中部機械製造廠的勞動過程，最接近本書中芝加哥的機械工廠，但引用布雷弗曼與艾德沃茲的理論多過布若威（張烽益1995），張聖琳與郭慧英直接引用了「霸權體制」來解釋台灣具壟斷性的大型民營工廠（遠東化纖與台塑南亞）內的生產政治（張聖琳1989，郭慧英1997），但她們所指出工人面對失業的壓力，以及「地主/長工」的傳統主義想像，卻是屬於家父長主義的特徵，林宗弘與幾位共同作者在大同工會的勞資關係研究中證實了這一點（林宗弘等2000）。古明君與藍佩嘉對台灣服務業的研究，比較了多層次傳銷與化妝品專櫃小姐的計件工資體制與情緒勞動的操縱（古明君1994，藍佩嘉1995），延續勞動過程與性別的議題上，有幾篇與布若威對話的作品（劉代倩1997，呂翠玲1999，陳秀曼2001）。方德琳將新竹科學園區的工程師社群的生產組織，超時工作加上高額的分紅入股制度，視為一種霸權體制（方德琳1997），就布若威「威嚇/同意」的分類來說是恰當的，但是就整個國家政治與生產政治的關係而言，國家對生產體制的介入與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福利支持，是脆弱的。林宗德與黃玟娟等對科學園區的勞動過程與性別分工有進一步的分析（林宗德2002，黃玟娟2002）。至於在台灣國營事業的生產體制方面，筆者的論文傾向以魏昂德的「新傳統主義」來看待戰後到解嚴前的台電公司生產組織，民主化的過程帶動工會的自主運動，則使之朝向「官僚霸權體制」轉型（林宗弘1999），周詩華則更深入討論輸配電部門的工作現場（周詩華2003），何明修對中油公司的研究，

透過「團結文化」的觀點，對布若威缺乏階級連結與抵抗面向的理論架構，提出質疑（何明修 2003）。

中國工廠研究集中於黨國政治與生產政治的關係上，台灣的資本主義私人部門早已是產業的主流，因此，台灣的勞動過程研究，大多數均延伸或批評了布若威的觀點，呈現出資本主義多樣化的生產組織與性別、市場結構等因素的互動。此間跨越兩種政治體制的，則有李靜君對香港與深圳同一家港資工廠不同勞動體制的比較（Lee 1995, 1998a），以及夏樂祥（1997）對廈門台資工廠的個案研究，此外，王宏仁與龔宜君也初步探討了越南與馬來西亞台資工廠內的勞動體制與族群關係的影響（王宏仁 2003，龔宜君 2003）。李靜君認為，香港的勞動法令殘缺且工會脆弱，甚至沒有基本工資的規範，而中國的勞動法令相對健全；然而，香港工廠的女工卻福利優渥，深圳的工廠體制十分專制——這是性別角色的形塑與勞動市場供需所導致的結果，對布若威國家政策與工會運動導致霸權體制興起的說法提出質疑。而夏樂祥與其他台商工廠的研究者如鄭陸霖（1999）等，則發現台灣中小企業網絡一旦到大陸投資，在勞動成本低廉的誘因下，則迅速擴張成泰勒化的大型工廠，是典型的專制體制。

筆者的回顧自然無法將台灣與中國的工廠研究一網打盡，但應足以指出布若威《製造甘願》一書對華人世界勞工研究的啟發，這些工廠民族誌與比較研究若能進一步延伸，將有助於澄清不同政治經濟制度條件下，華人工廠生產體制的特質與變遷，並且對於中國與台灣的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做出貢獻。

八

《製造甘願》一書，是布若威的勞動過程理論與擴展個案方法最完整的示範，也是很好的社會科學碩博士論文範本，這使得筆者興起翻譯的念頭。本書的翻譯工作始於 1999 年夏季，當我向台灣勞工陣線的同事張烽益兄提到這個想法時，才發現他已經著手翻出了序言與第一章的部份，但無以為繼，我便自告奮勇找到幾位對相關領域感興趣的友人合譯，其中第二章、第七章與註釋是筆者所譯，第三章是出自王鼎傑、第四章為沈偉如、第五章與第六章出自周文仁，第八至十章為鄭力軒，第十一章之後是魏希聖所譯，然而筆者在當年十月入伍，隨後幾位譯者負笈國外，王鼎傑在英國國王學院地理系、周文仁在法國里昂大學歷史系、鄭力軒在美國杜克大學社會系、魏希聖則在芝加哥念社工，譯文隨之四散全球，在 2003 年才透過網際網路，由鄭力軒兄協助筆者整合起來，補足缺漏部分，並由筆者與中華電信工會夏傳位先生兩人校閱。翻譯過程中，感謝群學出版社劉鈐佑總編輯的督促，李晏甄、王國強和湯凱傑三位編輯精心校編，南華大學何明修教授、台灣大學藍佩嘉教授與加州柏克萊大學劉華真博士閱讀譯文並提供意見，但筆者叨擾最多的，就是中央研究院的謝國雄教授與柯志明教授，事實上，是他們兩人的激勵才有這譯本，在此特表謝意。在這篇導言的最後，筆者應對幾個關鍵詞的翻譯，作些自我辯護。

就像許多英文詞彙一樣，本書最重要的關鍵字「consent」有幾重日常使用的與學術的含意，常見的用法如「consent

adult」，這是指成年人之間，未經抵抗而發生性行為時，就是默認而非拒絕此一行為的意思表示。在學術方面，則可以區分為（一）經過理性計算後的「同意」或贊同，例如許沃斯基假設經濟轉型，無論是資本主義轉為社會主義，或是相反的情況，短期內都會出現生產衰退的凹谷，以此解釋工人為何接受資本主義的現狀。（二）習慣性的「默許」，像布若威所強調的，玩進遊戲裡就等於先默認了遊戲規則。（三）道德上的「服從」，意思近似於韋伯所謂權威或支配的「正當性」。（四）比較少見的使用法，是可以與「consensus」混用，指的是人們對某件事物經過商議而得到「共識」或者一致的看法。幾經討論，筆者與夏傳位在校閱時，將「consent」依據脈絡譯為「同意」，並在電子郵件通信中，得到布若威本人的默認，或依柯志明教授所建議的「甘願」、偶爾依謝國雄教授建議，翻譯為「志願性服從」以求意思完整，與此對照的「coercion」與「force」，則翻譯成「威嚇」、「強迫」或「強制力」。

另外一個重要的詞彙是「game」，翻譯為「遊戲」或「競賽」，若是翻譯成「賽局」，則容易與理性選擇的賽局理論相混淆，反而失去原著中比較廣泛的、包含並非理性計算的意思，「making out」依謝國雄教授建議，翻譯為趕工競賽或趕工遊戲，而工人在限制產量的同時會留些成品，就是文中暱稱的「kitty」，在台灣的生產線上稱為「藏業績」，「chisel」比較接近的講法為「偷吃步」，故從之，讀者可以留意到民族誌中許多俗語的翻譯，都是採自台灣工廠裡類似的講法，而非直譯。至於「rule」這個字，若是在與韋伯有關的討論中，



譯為「法規」，若是在工人非正式的遊戲或競賽的討論中，譯為「(遊戲)規則」，若是在工作現場的明文規定方面，依據台灣的勞動法令，譯為「工作規則」，「contract」也依據台灣勞動法，逕譯為「團體協約」，而勞資雙方的定期談判直譯為集體協商，「shop floor」、「workplace」或「line」則以廠房或工廠裡、工作現場或是生產線上這幾個詞混著使用，基本上是台灣讀者熟悉的用詞，中國讀者恐怕要用「車間」、「合同」等詞語重新對照過。

這些詞語翻譯上的困難，其實一部份反映了布若威生產政治理論上的難處，比如說，「consent」這個概念，本身就具有模糊之處，在原著裡，布若威經常在前述三、四種意義中打轉，而「consent」與「coercion」的比例，決定了一個工廠是專制的或霸權的體制，這有兩個問題，第一，這比例要如何衡量？第二，這是兩個互斥的概念，還是獨立的概念？關於布若威這兩個概念的批評，不勝枚舉（Thompson 1983, Sturdy, Knights and Willmott 1992, Lee 1995, 謝國雄 1996）。「game」與「rule」本來在賽局理論與韋伯的科層支配類型中，有固定用法，布若威卻故意加以放寬與混淆，數種意義在英文是同一個字眼，在中文其實是不同的詞彙。最後，美國芝加哥工廠裡的許多現象，其實與台灣的計件工廠有類似之處，另一方面，台灣工人在現場的用詞與意義，又有不同的語言與文化脈絡，在翻譯過程中，我們也察覺到，這些用詞不僅體現了資本主義工廠的相似性，也反映了工廠文化上的差別，比如說，在本書幾位譯者的田野經驗中，台灣機械工廠裡並沒有「set-up man」，裝置歸零與調整的動作，都由操

作員一手包辦，我們因此找不到與這種職位對應的詞彙。這不僅是翻譯上的問題，也是工業社會學理論上的問題，值得讀者留意。

筆者認為，布若威的理論與方法論上的成就，膽識與創意或許多過嚴謹，甚至反證或許多過符合的例子，但是，正因為他將自己放在挑戰主流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戰鬥位置上，持續投身於田野與學術辯論之中，才得以成一家之言。如萊特對這位老友的评价，相對於當代社會學界分析與量化的主流，布若威對他而言是「一劑清涼有效的解毒劑」(Wright 1994)。筆者衷心期盼，在這全球化、自由化的保守論述橫行之際，《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一書的中譯出版，亦能分到些許解毒的效果。



參考書目 (不含與本書原著書目重疊部分，請讀者參酌)

- 方德琳 (1997) 《專業勞動雇員的勞動體制研究》，台大社研所碩士學位論文。
- 王宏仁 (2002) 《照本宣科的演員：越南臺商的廠內工會》，見蕭新煌、王宏仁、龔宜君主編：《臺商在東南亞：網絡、認同與全球化》，臺北：中研院亞太研究中心，頁 277-99。
- 古明君 (1994) 《強化性的連結：臺灣傳銷業中的傳銷邏輯與性別邏輯》，清大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呂翠玲 (1999) 《女性銀行員勞動過程之研究》，政大勞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吳介民 (2000) 〈壓榨人性空間：身分差序與中國式多重剝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1-44。
- 何明修 (2003) 〈工廠內的階級團結：連結石化工人的工作現場與集體行動〉，《台灣社會學》6：1-59。
- 波普爾 (Popper, Karl R.) (1987) 《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紀樹立編譯，北京：三聯書店。
- 林正弘 (1988) 《伽利略、波柏、科學說明》，台北：東大出版社。
- 林宗弘 (1999) 《台灣國營事業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以台電公司為案例的分析》，清大社研所碩士學位論文。
- 林宗弘、鄭力軒、徐千惠、廖偉程、廖郁毓、林良榮 (2000) 《打拚為尊嚴：大同工會奮鬥史》，台北：台灣勞工陣線。
- 林宗德 (2002)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半導體晶圓廠的工作研究》，清大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周詩華 (2003) 《三十年來臺電配電線路維護的勞動過程與勞動組織之變化 1971-2001》，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柯志明 (1993) 《台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夏樂祥 (1997) 《臺商企業的勞動過程研究：以馬具精密鑄造業之計件制工廠為例》，台大社研所碩士學位論文。
- 郭慧英 (1997) 《台灣自主工會的運作——民營大型企業的個案研究》，台大社研所碩士學位論文。
- 陳志柔 (2001) 〈中國大陸農村財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區差異〉，《台灣社會學》2：219-262。
- 陳秀曼 (2001) 《移動與束縛：台汽客運車掌小組的勞動過程》，台大城

- 鄉所碩士學位論文。
- 張烽益 (1995) 《勞動過程的控制與反制：台灣製造業工廠的個案分析》，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張聖琳 (1989) 《空間分工與勞工運動：新埔地區的個案研究》，台大土木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黃玟娟 (2002) 《性別與技術：臺灣晶圓廠之技術勞動體制》，東海大學社研所博士學位論文。
- 劉代倩 (1997) 《女性空服員勞動主體性之研究：以工時制度與勞動過程做檢視》，政大勞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鄭陸霖 (1999) 〈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5：1-46。
- 藍佩嘉 (1995) 《銷售的政治：性別化的勞動身體規訓——兩種化妝品銷售勞動體制（百貨公司、傳銷）的比較研究》，台大社研所碩士學位論文。
- 邊燕杰編 (2002) 《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北京：三聯書店。
- 謝國雄 (1989a) 〈外包制度：比較歷史的回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 (1)：29-69
- (1989b) 〈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 (2)：11-54
- (1991) 〈網絡式生產組織：台灣外銷工業中的外包制度〉，《中研院民族所集刊》71：161-82
- (1992) 〈隱形工廠：台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3期：137-60
- (1997) 《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專書第二號，南港：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龔宜君 (2002) 〈跨國資本、族群與勞動控制〉，《台灣社會學》3：253-289。
- Anderson, Perry. 1979.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 Block, Fred L.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2. "Introduction." In *Marxist Inquiries: Studies of Labor, Class, and States*, edited by M. Burawoy and T. Skocp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Verso.
- . 1989a.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 18:759-805
- . 1989b. "The Limits of Wright's Analytical Marxism and an Alternative." Pp. 78-99 in *The Debate on Classes*, edited by Eric Olin Wright, London: Verso.
- . 1998.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March): 4-33.
- . 2003a. "Revisits: An Outline of a Theory of Reflexive Ethnograph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 645-679
- . 2003b. "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and Society* 31(2): 193-261.
- Burawoy, Michael et al. 1991. *Ethnography Unbou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0.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awoy, Michael and János Lukács. 1992a. *The Radiant Past: Ideology and Reality in Hungary's Road to Capital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92b. "A View from Production: the Hungarian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In Smith, C. and Paul Thompson ed., *Labour in Transition: the Labour Proces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 Burawoy, Michael and Pavel Krotov. 1995. "The Soviet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Worker Control and Economic Bargaining in the Wood Industry." In Simon Clarke, Peter Fairbrother, Michael Burawoy and Pavel Krotov. *What about the Workers? Workers and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Russia*, P.56-90
- Burawoy, Michael and Erik Wright. 2002. "Sociological Marxism." Pp.459-86 in Jonathan Turner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Plenum Books.
- Byles, Jeff. 2001. "Tales of the Kefir Furnaceman." in *the Village Voice*.
- Chan, Anita. 1993.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 (January): 31-61.
- _____. 1997. "Chinese Danwei Reforms: Convergence with the Japanese Model?" Chap.4 in *Danwei*, edited by 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 New York: M. E. Sharpe.
-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Y: Basic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Birth of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 Freeman, Derek. 1983.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nthony.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London: Hutchinson.
- _____.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luckman, Max. eds. 1964. *Closed Systems and Open Minds: The Limits of Naivety in Social Anthropology*. Chicago: Aldine.
- Grint, Keith. 1991. *The Sociology of Work: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K: Pol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lated by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 Beacon Press.
- Hirst, Paul Q. and Graham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2nd.
- Jowitt, K. 1974.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Marxist-Leninist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1171-91.
- Knight, David and Hugh Willmott ed. 1990. *Labor Process Theory*. New York: Macmillan.
- Kornai, Já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uhn, Thoma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per, Adam. 1983.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Rev. Edition. London;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ee, Ching Kwan.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June): 378-97.
- _____. 1998a.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 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Modern China*, 24(January): 3-33.
- _____. 1998b.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J.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 Mead, Margaret. 1928. *Coming of Age in Samo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Milkman, Ruth. 1987. *Gender at Work: The Dynamics of Job Segregation by Sex during World War II*.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Mok, Ka-ho and Cai He. 1999. "Beyond Organized Dependence: A Study of Workers' Actual and Perceived Living Standards in Guangzhou."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13(1): 67-82.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 Nee, Victor and David Stark. 1989.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sow, Sigmund and William H. Form. 1962. *Man, Work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the Sociology of Occup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Perry, Elizabeth J. 1993.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2.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 Piore, Michael J. & Charles F. Sabel.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Popper, Karl R.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Porter, Donald E., Philip B. Applewhite and Michael J. Misshauk ed. 1971. *Studies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Management*. 2nd. London: International Textbook.



- Przeworski, Adam. 1985.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y, Donald. 1980. "Review of 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24: 329-39.
- Sabel, Chars F. 1982.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bel, Chars F. and David Stark. 1982. "Planning, Politics, and Shop-Floor Power: Hidden Forms of Bargaining in Soviet-Imposed Societies." *Politics & Society*, 11(4): 439-75
- Scott, W. R. 1998.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 Skocpol, Theda. 1984. "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Pp. 356-91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and Peter Evans.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Theda Skocpol and Peter Evan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37.
- Smith, C. and Paul Thompson ed. 1992. *Labour in Transition: the Labour Proces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Vicki. 2001. "Ethnographies of work and works of Ethnographers." Pp. 220-33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et al.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Stark, David. 1986. "Rethinking Internal Labor Markets: New Insight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August): 492-504.
- Sturdy, Andrew, David Knights and Hugh Willmott. 1992. *Skill and Consent: Contemporary Studi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 Szelenyi, Ivan. 1982.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 In *Marxist Inquiries: Studies of Labor, Class, and States*, edited by M. Burawoy and T. Skocp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hompson, E. P. 1981. *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 Thompson, Paul. 1983. *The Nature of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Debates on the Labour Process*. 2nd E. London: Macmillan.
- Van Velsen, Jaap. 1967.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 Pp. 29-53 in *The Craf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ed. by A. I. Epstein. London: Tavistock.
- Walder, Andrew G. 1983. "Organized Dependency and Cultures of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November): 51-76.
- _____.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89. "Factory and Manager in an Era of Reform." *China Quarterly* 118(June): 242-64.
- _____. 1994.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23: 294-323.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Wolf, Eric. 1966.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Wright, Eric Olin.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 _____. 1994. *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London: Verso.
- Wright, Eric Olin et al. 1989.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Verso.
- 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 (1997)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Y: M. E. Sharpe.
- You, Ji. 1998. *China's Enterprise Reform: Chang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fter Mao*.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Zhao, Minghua and Theo Nichols. 1996. "Management Control of Labor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ses from the Textile Industry." *The China Journal*, 36 (July): 1-21.